

高教探索

Higher Education Exploration

2007年第1期

大学学习学在中国：回顾与展望*

吴薇

摘要：学习与生俱来，是人类重要而又普遍的活动。在中国，关于大学学习学的研究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不断发展兴起的领域。中国大学学习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这短暂的20多年时间里，大学学习学走过了一条从稚嫩到相对成熟的发展之路，至今仍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良好发展态势。本文就大学学习学研究的意义、研究的进展以及研究的展望作一简要的综述。

关键词：中国；大学学习；大学学习学

学习与生俱来，是人的本性之一。中国至圣先师孔子在《论语》的开篇一句话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1]孔子提出的“启发诱导”“举一反三”“学思并重”等教学原则，可以认为是“学会学习”的最早体现。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开头一句话就是：“求知是人类的本性。”^[2]两位生活在不同国度的伟大哲学家却得出近乎一致的结论，这不是巧合，而是恰好说明，学习自古以来就得到不同文明的普遍重视，并成为它们共同自觉的行为。应该说，学习自古就有，与之相随的对学习的研究也历史悠久，但作为一门具有科学形态的学习学的出现则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在国外，学习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了；在中国，大学学习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大学学习学”是研究大学生学习活动现象及规律，并用以辅导大学生科学学习，培养提高大学生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一门新兴学科。^[3]在这短暂的20多年时间里，大学学习学走过了一条从稚嫩到相对成熟的发展之路，至今仍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良好发展态势。

一、中国大学学习学的过去与现在

20世纪中叶以来，学习作为人类联系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重要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已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一场世界性的学习革命，一些发达国家发出了步入学习社会的时代呼声。最早的预言者应数美国学者赫钦斯，他于1968年出版了《学习社会》一书，阐发了以人性为出发点，建立开放的人人参与的学习社会的思想。1972年，以富尔为主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提出了以《学会生存——教育

世界的今天与明天》为主题的报告书，从此，“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的声音传遍了整个世界。1973年，美国卡耐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发表了《迈向学习社会》一书，比较具体地描述了学习社会的构想，说明了从传统学习向新的学习方式转变的原则。1979年，国际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在其代表作《学无止境》一书中，深刻地指出，人类社会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学会学习”品质上。在此国际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教育工作者在历史上已积累的学习之道及国外学习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学习是一门科学。自此，学习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人们学习活动的现象及其规律并用以指导人们学习的新兴学科应运而生。研究学习的组织纷纷建立，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指导学生学习的课程不断诞生，展示出它巨大的生命力，从而得到普遍的认同。要言之，20多年来，中国大学学习学研究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分散走向联合，从粗糙疏阔到逐步系统成熟。

(一) 自发研究阶段(1980—1985)

1. 理论酝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对学习学进行理论上的酝酿。最早提出“学习学”一词的是我国人才学专家王通讯。他于1980年4月12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愿你风华正茂》一文中谈到，“建立一门‘学习学’显得十分必要”。

现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张笛梅研究员发表在1981年11月的《人才》杂志上的《掌握打开知识宝库的金钥匙》一文，专门论述了“学习本身是一门科学”。1982年，他在《怎样科学地学习》这本书里比较系统地

收稿日期：2006—09—15

作者简介：吴薇，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福建厦门/361005）

* 本文系厦门大学“985工程”“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阐述了学习学理论。山西大学的林明榕在1985年7月参加“中美教学法学术交流”时提交的论文《“学法”在教学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新探》中，提出了建立学习学的一系列设想。会后他又写了《建立学习学的构想》，发表在《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一期，并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新兴学科》、《人民日报》海外版等一些报刊转载、摘登。此文论述了当今人类学习活动面临的挑战，阐述了建立学习学的必要性和作用，构思了学习学研究的广泛课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4]

这一批学习学理论的开拓者都强烈地感到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讲究学习方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建立学习学的设想，并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构想体系，拿出了初步的理论成果。当时，他们之间虽未建立什么联系，却有大致相同的思想和见解。这正说明建立学习学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实践的需要，是时代的呼唤。

2. 实践探索

除了上述学习学的理论准备外，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若干所大学里出现了学习学课程的实践探索。如，1984年起，上海农学院梅松龄先后在9个班级开设学习方法论选修课；1985年，山西大学林明榕开设了“大学生学习方法论”课程；1985年，西安交通大学高教所林毓琦教授开设“大学学习导论”课程等。这些零星的实践，既是对学习学理论的检验，也在实践探索中积累了经验，完善了理论，有益于将学习学理论探讨引向深入。

(二) 自觉研究阶段(1986—1995)

由自发研究阶段到自觉研究阶段，其突出的标志就是学习学研究由分散走向联合、学习学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以及学习学的教学与研究的蓬勃兴起。

1. 全国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会的筹备与建立

1986年以前，许多学习学研究者产生了建立学术组织的愿望。1986年9月，由山西大学林明榕发起，在南京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学习科学讨论会。这次会议有7人参加。会上成立了全国学习学研究会筹备组，并决定在筹备组下设联络点。经过反复酝酿和艰辛的筹备，“全国第一届学习科学讨论暨讲习班”于1987年6月在南京举行。这次会议完成了下列几项任务，拉开了国内有组织地研究学习学的序幕。一是成立了“全国学习科学研究会筹委会”，林明榕担任筹委会主任。筹委会下设学术组、组织建设组、刊物编辑组、智能开发组、情报组，并成立了各大区、各系统研究会的筹备组。筹委会的成立初步把全国的学习学研究者组织在一起，从组织上保证了学习学研究的联合行动。二是来自24个省、市、自治区的126名代表就学习学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建立学习学的问题、学习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学习方法及其指导的问题。会议收到论文130多篇，著作5本，大部分著作和论文质量是比较高的。

南京会议后，高教界的同志为了加强横向联系，交流教学经验，组织课题攻关，于1987年8月在西安交通大

学召开了“学习导论课讲习与研讨会”，并成立了“大学中专学习论教学与研究协作组”。随后，1988年2月成立了山西省学习学研究会，同年4月成立了武汉市学习学研究会，7月成立了全国职工学习学研究会，8月成立了全军学习学研究会。1988年10月召开了“成都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收获是：检阅和总结了“南京会议”后一年多来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学术交流，把学习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研究的问题深了，研究成果多了，队伍扩大了；正式成立了全国大学学习学研究会。

2. 学习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在这一阶段，学习学理论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其中有几本较重要的著作：(1)林毓琦所著的《大学学习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这是一本较系统的研究大学学习问题的专著，书中针对大学生在学习与成才中的一系列问题，介绍了大量有关的科学知识，提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在此基础上，林毓琦教授推出了《大学学习学》(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深化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和教学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王通讯主编的《青年学习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本书涉及到学习科学的基本方面，总结了历史上的学习思想遗产，介绍了各种学习方法和技巧，收集了较全面的资料，有很强的资料性和实用性。(3)王荣纲、曹洪顺主编的《大学学习学》(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对准如何提高大学生学习自觉性与能动效率这个切入点，展开了教育学的科学方法论的系列论述；运用教育学、心理学、思维科学的原理原则，提炼出大学生学习规律的新范型和完整体系。^[5]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学习学”从产生至1994年已出版专著三十余部，发表论文2000余篇。这些论著，为我们研究“学习学”问题，奠定了良好的科学理论基础。^[6]

3. 大学学习学的教学与研究

同前一阶段的只有少数几所大学开设学习学课程不同的是，这一阶段里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学习学课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以东北大学为例，该校针对大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于1986年开始先后开出了“大学生学习学”、“大学生学习指南”、“大学英语学习方法通论”、“大学物理学习方法通论”、“高等数学学习方法”、“充分利用大学图书馆”、“创造力开发”、“科学研究方法入门”等选修课和讲座。至1994年底，已开出各类讲座17次、232学时，听课学生3400余人次；开出选修课13门(次)、382学时，听课学生1480人。无论是讲座还是选修课都取得很好的效果。围绕授课内容编写的教材《大学生学习指南》(1990年由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93年获全国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会优秀著作二等奖，1995年又荣获全国学习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在开课的同时，他们坚持进行大学学习科学尤其是大学学习科学理论、学习过程、学习规律的研究，努力做好教学与理

论研究密切结合。他们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八五”重点研究项目——“学生学习现状的调查和学习指导的研究”，研究报告《大学生学习现状的调查和学习指导的研究》荣获中国学习科学学会、国家教委“八五”重点课题优秀成果二等奖。^[7]以上成果也促进了“大学生学习学”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把教学和研究推向一个新层次。

另外，还有一些大学积极开展教学实验研究，把学习学理论探讨与实验紧密结合起来，使理论上的探讨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如医学学习学的倡导者王山青教授在教学中按照实验班和对照班进行试验，发现实验班与对照班的学生在学习品质和学习成绩上存在较明显的差异。^[8]这就从实证意义上肯定了学习学的价值，增强了学习学研究的科学性。

（三）蓬勃发展时期（自1999年至今）

将1999年作为划分不同时期的分界点，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知识经济的初露端倪和学习型社会的呼之欲出带给世纪末的中国无限憧憬。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1999年中国先后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在1999年第三次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21世纪的中国应该成为人人皆学之邦。”这为大学学习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二是国际学习变革潮流对中国大学学习学的推动与影响。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出现了两份阐发学习变革的有名的报告书，一份是欧洲联盟于1995年发布的白皮书，名字叫《教与学：迈向学习社会》，它的目的是指导1996年即“欧洲终身学习年”的各项学习活动。另一份报告书的名字叫《学习：内在的财富》（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是由以德洛尔为主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1世纪教育委员会发布的，它实际上是新世纪的学习宣言书，全面阐述了国际社会对人类未来和学习问题的理解。另外，新西兰学者戈登·德莱顿和美国学者珍妮特·沃斯合写的具有世界影响的畅销书《学习的革命：通向21世纪的个人护照》于1997年底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学习的革命》在中国出版史上制造了空前的声势，在文化界、教育界引起广泛关注，图书销售量达500万册之多，引发了中国革新学习观念的热潮。这为中国大学学习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援。

三是1999年中国大学首次大幅度扩招，在师生比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应有的学习质量和教育水平的问题显得格外突出。这为中国大学学习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和直接动力。

在这个阶段，中国大学学习学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不断走向系统深入、开放多元与科学实效。

首先表现在学习学的理论体系的完善。以前研究内容主要局限于学习方法指导，而当前学习学理论体系至少包

括学习心理学、学习对象学、学习方法论、学习策略学和学习指导论等五大部分^[9]。这段时期，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如西安交通大学高教所近年来先后出版的《大学学习学》、《学习风格与大学生自主学习》和《课堂学习论》等专著；刘典平、于云才两位学者继《人的发展与学习》后撰写了《学习学》（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它是面对高科技革命的挑战，从我国的文化传统出发，殚精竭虑、通力合作而创作出来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关于学习革命的学术专著。^[10]

其次，研究方法由传统单一的思辩与定性研究走向多元，实证与定量的研究方法被应用，增强了研究的科学性。如由西安交通大学陆根书教授和于德弘教授所著的《学习风格与大学生自主学习》一书，正是致力于改变这种局面。本书的作者立足于大学生学习风格的研究，采取了量化与质性研究相结合，以量化研究为主的研究范式，通过对3000余名大学生的调查，实证地分析了大学生学习风格与学习结果之间的关系，总结出“自我管理及意义导向的学习风格”、“缺乏管理及再现导向的学习风格”和“学习过程外部管理及情景导向的学习风格”三种类型的大学生学习风格，并深入研究了影响学习风格的因素。在此基础上，他们设计开发了一个能够足量地测评和监控学生学习风格的工具——大学生学习风格量表，为大学有关管理部门、教师和学生评估学习风格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支持，也使得书中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因建立在严格的实证分析基础之上而更具操作性和可靠性。^[11]

再次，研究重点发生明显改变，即从过去对认知的研究到对元认知的研究，从对一般性学习策略的研究到对学生自主创造性学习的研究，从对课堂学习的研究到对网上虚拟学习的研究，从对客观主义学习理论研究到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研究。

最后，大学学习学的教学实践更加成熟，课程教材建设更加科学，经验交流更加密切。

2000年，教育部高教司把“大学生学习改革”列入“新世纪教学改革工程”的课题计划，并把重编《学会学习》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教育部高教司2001年召集北京、上海等部分省市教育厅（教委）高教处负责人及其下属部分高校的教务处负责人，举办“大学生学习改革与创新研讨班”。中国高教学会下属的“全国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会”于2001年10月16日至20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学术年会，就“大学学习学”的课程建设问题，交流工作成果、经验与学术思想。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重新组织编写的国家级“十五”规划教材《学会学习》一书，在2005年秋季开学出版发行。它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第一部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编写的学生学习指导教材，标志着“学会学习”正在由教学工作的“边缘地带”走向受重视的“中心地带”。^[12]

二、中国大学学习学的未来走向

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大学学习学在中国走过了从稚嫩到相对成熟的发展历程；但处在学习化社会和终身学习时代，学无止境，学习学的发展也没有终点。未来的学习学发展应该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学习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发展。在学习学研究中，我们要把学习学置于全球范围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的主流发展趋势的大背景下，既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学习研究的最新成果，也要保持文化自觉，立足本国实际，自主发展学习学理论；既要规避盲目崇拜、亦步亦趋的倾向，也要纠正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倾向。为此，我们要加强学习理论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力争做到研究成果的互惠与共享。

(二) 学习学研究的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在学习学研究中，我们既要注意借鉴现代成果，如心理学、教育学、脑科学等新近进展，也要注意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习传统中吸取历史的智慧，做到古为今用。

(三) 学习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建设学习学的理论体系，努力认识并把握学习活动的内在机制及其规律，但也不可脱离学习实践而主观臆想，为发展理论而发展理论，而要让理论研究面向实践，跟上实践，指导实践；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实践探索，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完善理论，进而进一步指导实践。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应该相互渗透与交融，同步并行发展。

(四) 学习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与会通。学习是一个复杂的活动，涉及哲学、思维科学、信息科学、人才学、教育学、心理学、脑科学等多学科领域，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研究学科。因此，学习学研究的方法也是多学科和多样化的，既可用思辩的方法，也可用实证的方法；既可用定性研究方法，也可以用定量的研究方法。但不管采用哪个学科、何种方法，都要为学习学理论发展服务。

(五) 学习学研究的质与量。这既是对研究队伍而言的，也是对研究成果来说的。应该说，以往从事学习学研究的队伍达到了相当的数量，在未来的发展中，一方面要继续从数量上壮大学习学研究队伍，另一方面也要从质上提高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研究成果也同样要在数量上不断扩大，在质上不断提高。

(六) 学习学研究内容的不变与变。随着时代的进步，

学习学增添了新的内涵。在此背景下，学习学研究内容除了要维持相对的稳定性外，还应与时俱进，积极应对新的学习变革，例如积极应对自主性学习、建构主义学习、虚拟学习等新的形式。

总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深入，大学生的规模不断扩大，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也给大学学习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因为，未来教学改革最终落脚点还应当落在学生的学上。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了学生学的问题，也就是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使学生学会学习，我们的教育改革才能真正充满活力。为了更好地应对挑战，我们要处理好学习学未来发展的六对关系，帮助大学生提高学习品质，提高学习效率，取得学习成功，推进学习化社会的早日成熟。

参考文献：

- [1] 论语·学而篇[M].北京:中华书局,2005.1.
- [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
- [3][7] 李绍荣.“大学生学习学”教学实践回顾[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6(2).
- [4] 王凤峒.学习学研究综述[J].高等建筑教育,1989(1).
- [5] 冯中一.一项“教育创造工程”的新建构——《大学学习学》漫评[J].烟台师范学院院报(哲社版),1993(2).
- [6] 李景岳,陈竹.学习科学的兴起与建立[J].熊岳农专学报,1994(1).
- [8] 王山青.开展指导医学学习的教学[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1994(4).
- [9] 张泽生.关于学习学的思考[J].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2).
- [10] 谷宝田.一块新学科的奠基石——《学习学》评介[J].中国图书评论,2000(9).
- [11] 潘懋元.《学习风格与大学生自主学习》书评[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2).
- [12] 张笛梅.让“学会学习”走进课堂[EB/OL].http://www.esph.com.cn/note1.asp?id=48.